

第五章： 卜葬華人永遠墳場的著名人物

唐紹儀

唐紹儀(1862-1938)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說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曾擔任過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這樣的人物長眠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可說有點令人意外。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唐家鎮人。唐父巨川是上海的茶葉商人，唐自幼到上海讀書，1874年官派留學美國，完成中學課程後於1881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惟當時清廷已決定召回留美幼童，唐無奈離美。回國後，唐被派往天津的洋務學堂進修，四年後入職天津稅務衙門。1889年，唐被委任為駐龍山(朝鮮境內)商務委員，任上唐紹儀表現出色的外交才能，並與當時駐留朝鮮處理通商事宜的清廷要員袁世凱建立關係。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紹儀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

1901年，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期間唐辦理接收八國聯軍佔領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三年後，清廷任唐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代表談判西藏問題。自1906年起，唐紹儀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郵傳部尚書等職。

1911年武昌起義後，清廷任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唐受任袁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理伍廷芳談判議和並達成協議。後唐紹儀加入同盟會，並得到革命黨人和袁世凱的推選及任命，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然而袁世凱習性大權獨攬，對唐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咸恪遵約法”甚為不滿，不久唐亦“徹悟袁之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遂憤而提出辭呈，時任總理不足三個月。袁暴斃後，唐力主恢復舊約法和國會，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利誘。

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初，北洋軍閥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擔任南方總代表，惟雙方終未達成協議。蔣介石上台後，唐紹儀只以黨國元

老自居，擔任一些閑職。卸下公職後，唐定居上海法租界。

1929年，唐紹儀就任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打算將中山縣建設成為全國各縣的模範。1931年，唐兼任中山縣縣長，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畫。該計畫包括基本建設、發展實業、加強農漁業和鄉村建設、引進外資和發展教育諸方面，並以開闢唐家無稅商港為重點。唐紹儀在任為政相對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被稱為“布衣縣長”。可是唐卻遭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排擠，三年後被逼去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並未轉移後方。1938年9月30日，國民政府軍統特務為了不讓唐紹儀為日人利用，在唐紹儀上海寓所將其刺殺。唐遇刺後，部分國民黨元老十分不滿沒有掌握唐失節確證，就將其殺害。蔣介石下令付治喪費五千元，並將唐生平事蹟存付國史館，以平息風波。

唐紹儀逝世後，家屬本擬把其遺體運回唐家灣安葬。靈柩於10月20日從上海運抵香港，先暫存東華義莊以便擇地安葬。惟日軍剛於同月發動廣東作戰，靈柩抵港翌日更佔領廣州，唐的家鄉中山成為淪陷區。在此情況下，把靈柩運回唐家灣遂顯得困難，而家屬亦考慮到下葬後唐之墳塋或可能遭人破壞，故最後放棄原籍安葬之打算。後唐的長子唐榴主張葬於澳門，不過繼室吳維翹卻希望卜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幾經調停，母子仍相持不下，並往見華民政務司理論，惟事件仍未得解決。其後雙方為此進行訴訟，最後高等法院宣判吳氏得直，1940年底，唐紹儀終於下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一場歷時兩年的風波始告結束。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仲申、民友、子民，浙江紹興山陰縣人。光緒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貢士，但因故未參加當年殿試，兩年後始參加壬辰科補殿試，中二甲進士，點庶吉士。光緒二十年(1894)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蔡元培留心新學，戊戌變法失敗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無望，斷然離開翰林院，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唐紹儀遺柩 昨晨由滬運抵港

○ 暫厝香港待平靜後運原籍安葬
 ○ 秘書陳夢楚談唐氏被刺之經過

中央委員唐紹儀於去月卅日
 上午九時，在上海法租界
 開森路，乃婦諸昌年之家，被
 兇徒謝志雲王竹軒等三人，
 以利斧行刺，發彈後送醫院
 醫院救治，幸以傷重不起，享
 年七十八歲，遺體由英國領
 事館殮殮，唐夫人吳維翹女
 士及長公子唐榴將柩殮葬，
 即離港赴滬，主持喪務，至本
 月十八日，唐氏靈柩始由滬
 運抵港，於昨晨十一時，
 抵港，扶柩南來者有唐夫人、
 長公子唐榴次公子唐任唐
 二小姐、姪唐宗岳、唐氏任
 秘書陳夢楚等十多人，各情分
 如下。

唐氏親故 唐氏靈柩
 設奠公祭 於昨晨
 十一時半，
 附搭國慶皇后輪抵港，唐
 夫人吳維翹女士、隨長公子
 唐三公子、次公子張謙
 夫人、及其十三女公子等扶

1938年10月唐紹儀靈柩運抵香港，本地報章曾廣泛報導。

1902年，蔡在上海與章炳麟等成立中國教

育學會，並擔任會長。同年秋又創立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創辦《俄事警聞》（後改名《警鐘日報》），提倡民權，鼓吹革命。

1904年，蔡與龔寶銓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密謀武裝起義，並於次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在駐德公使孫寶琦協助下，蔡前往德國進萊比錫大學聽課。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不久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及北京政府唐紹儀內閣教育總長。上任後，蔡即提出摹仿西方教育制度，廢除讀經等改革措施，惟不久卻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而辭職。1913年，蔡元培遊學德、法兩國，從事教育、哲學及美學研究。1915年與李石曾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次年與吳玉章等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年，蔡元培回國，次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蔡主力改革北大體制，創辦科研機構，倡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蔡元培採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大量引進新人物，開北大學術研究、思想自由之風氣。他還支持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贊成文學革命，並倡導科學和民主，其努力終使北大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1923年，蔡因抗議教育總長彭允彝干預司法而辭職，後赴歐居住。

1926年2月，蔡元培回國，後響應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次年，蔡倡議改教育部為大學院作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並在全國實行大學區制。同年10月，蔡元培被委

任為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1928年，蔡改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杭州及上海設立國立藝術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及國立音樂院（現上海音樂學院）。

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一直奔走倡導抗日。1932年，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人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的特務統治。

1937年8月，日軍開始攻擊上海，蔡元培與妻兒先後從上海抵香港避難，寄居九龍柯士甸道。寓港期間，蔡元培的健康狀況雖然一直不佳，卻仍關心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同時參與其他文化及抗日活動，並積極支持香港的新文字運動。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於寓所因頭暈失足跌倒，後被送往養和醫院，兩天後不幸逝世。3月10日，靈柩出殯，執紼者五千餘人，送殯者更逾萬，當日全港的學校、商店均下半旗致哀。同月24日，全國各地同時舉行追悼大會。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學人如此受到各界各黨隆重紀念，可說空前絕後。



蔡元培先生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墓碑。

蔡元培的靈柩其後暫存東華義莊，根據當時的報導，負責喪葬事宜的有關人士原打算待抗戰勝利後再把靈柩歸葬內地，惟最後仍決定下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這位中國近代文化巨人，自此長眠香港。

周壽臣



周壽臣(1861-1959)，原名長齡，香港黃竹坑新圍人。十一歲入讀中央書院，接受西方教育。同治十二年(1873)，獲容閱選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時被選中的還有唐紹儀、詹天佑、梁如浩等人。次年周壽臣抵美，先進入溫斯第小學(Winsted Local Grammar School)唸書，一年後入讀菲立斯學院(Phillips Academy)，繼續學業。1881年，周壽臣與唐紹儀同時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不久清廷召回留美幼童，周被迫返國。

回國後，周壽臣被派往天津海關，處理稅務。後袁世凱總管朝鮮，周輾轉到其麾下，十五年間，由最初的一名翻譯員晉升成為署理仁川領事。

1898年，周壽臣到天津輪船招商局任副幫辦兼西文翻譯。周上任後提出多項改善建議，更因恰當處理“拳匪之亂”(義和團)時期天津輪船招商局的業務，深得當時總督盛宣懷的器重。“拳匪之亂”後，

周因代表津局向英美列強追討被佔財產有功，於1903年獲提拔，出任關內外鐵路總辦，官至二品。其後周氏還協助籌辦鐵路學堂，培訓國內鐵路專才。1908年，周壽臣奉調任“奉錦山海關兵備道兼山海關監督”，負責管理於英法聯軍之役後開埠的牛莊(今營口)，直至滿清覆亡。

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周壽臣選擇抽身而退，與妻兒辭官返港。袁世凱特以贈與三等嘉禾勳章，以資表揚。

1917年，周壽臣獲港英政府贈予太平紳士銜；兩年後，成為潔淨局議員。1921年，周氏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並獲港督司徒拔爵士推薦，加入香港大學校董會。周壽臣其後積極推動港大創立中文學院，支持中國文化研究，以扭轉政府過往鄙視中文及華人文化的沿習。1935年，周氏參與成立香港仔兒童工藝院，使失學兒童能夠學一技之長，得以自立。周氏還身兼數職，擔任多個慈善機構的要職，並大力推動廢除一些他認為不合時宜的華人風俗和習慣如“妹仔”制度和吃狗肉等。

由於周壽臣聲名顯赫，人際網絡廣闊，不少中外商人均向他招手。周氏先後加入南洋兄弟煙草、油麻地小輪、香港電話、香港電燈等公司的董事局，其中以創立東亞銀行一事最為天津樂道。一直以來，香港銀行業均操於英資外商之手，華人銀號完全無法分一杯羹，這亦限制了華資企業的擴張。1918年，周壽臣與一群華人商賈成立東亞銀行，為華資企業提供資金。自1925年起，周氏更出任東亞銀行主席，並

一直擔任該職至逝世。此外，他亦涉足地產界，發展半山及黃竹坑等地。

省港大罷工(1925-26)期間，作為華人領袖，周壽臣應邀協助調停，並因表現積極而獲港府賞識。1926年初，周壽臣獲英皇冊封為爵士，繼何啟、韋玉、何東後成為第四位本地華人爵士。5月，港督金文泰爵士更委任周壽臣為香港史上第一位華人行政局（舊稱議政局）議員。

年紀老邁的周壽臣決定於1936年退任兩局議員，並獲英皇賜予終生享有“閣下”（The Honourable）*稱謂。國民政府亦授三等嘉禾勳章予周壽臣，確立其華人社會領袖的地位。

*按官方慣例，在任行政及立法局議員皆可在其名字前加上“The Honourable”尊稱，惟當他們離任後，則不能再使用這稱謂。

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周壽臣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與羅旭龢等人成立由日人主導的“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處理糧食、治安等問題。1942年2月，磯谷廉介受派來港出任總督一職，他上任後隨即解散該會，並以“香港華民代表會”及“香港華民各界協議會”代之，自此“兩華會”成為日方與華人的溝通橋樑。周壽臣受任為“香港華民各界協議會”主席，以自身的特殊地位，協助華人生活，減輕市民的困苦。日軍投降後，港英軍政府迅速恢復周氏“爵士”的稱謂，這亦反映周壽臣在日佔時期，並沒有做出有損香港整體利益的事情。

二次大戰結束後，聲高譽隆的周壽臣與何東一樣，在古稀之年仍積極推動社會的教育及公益，報章及社會人士均稱兩人為“Grand Old Men of Hong Kong”，以示尊崇。

1959年初，周壽臣安詳地離開人世。喪禮於周氏府第“松鶴居”舉行，執紼者人數高達二千。除港督柏立基爵士及一眾軍政高官外，參加者還包括各國使節、中外官紳名流，以及各社團領袖。周氏遺體其後下葬離其出生地不遠的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這也為他傳奇的一生劃上句號。



1953年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周壽臣(右三)及何東(右四)以香港華人代表身份，列席由港督葛量洪爵士主持的電台廣播。

區德

區德(1840-1920)，又名區澤民、區衍德，廣東南海人，因女兒下嫁何啟長子何永貞，故與何啟有著姻親的關係。



區德為香港地產及零售業早期先驅之一，1878年已在中環開設昭隆泰百貨店，經營傢俬、洋雜、珠寶、和攝影器材等生意，百貨店所在的昭隆街，即從公司名字得來。1908年，區德出任東華醫院總理。



約1910年位於中環德輔道中的昭隆泰百貨店。

辛亥革命後，隨著大批華人湧入香港，何啟於1912年向區德及數位友人提出九龍灣填海及房地產計劃。其後區德聯同韋玉、周壽臣、曹善允、周少岐、伍朝樞、區權初、黃廣田及莫幹生等，籌組以他及何啟名字而成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開始與港府磋商九龍灣填海計劃。這項計劃是香港歷史上首個全由華人提出、規劃及投資的基建工程，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意義，可說是香港華人邁進現代社會的一次重要經驗。

該計劃的重心是建造一座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與以往華人聚居地如上環、油麻地相比，這座城市非常現代化，居住環境和設施相當優越。自1914年起，區德本人出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公司辦事處即設於昭隆泰百貨店樓上。不過何啟卻於這一年突然去世，有關發展因而一度受阻。後經過兩年磋商，填海計劃終於獲得英國殖民地部及港府批准，並於1916年底開展工程。同一年，區德亦以八十高齡於上海在他創辦的療養院逝世，遺體後來運回香港安葬。

區德逝世後，遺囑其中一項是捐款一萬元於啟德濱興建一所學校，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亦捐助一萬元贊助。學校於1926年在曹善允主持下建成，校名從區德的別名澤民和莫幹生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定為民生書院。在此之前，區德亦在香港大學籌建期間捐助一萬元，成為最早響應興建大學的本地商人之一。

九龍灣填海計劃首期工程完成後，隨即興建住宅。數年間，原屬鄉郊市集的九龍城出現一番新景象。可惜有關計劃後期卻因一連串的工潮（特別是發生於1925及1926年間的省港大罷工）及經濟不景等原因導致停滯不前；地價下滑對房屋的銷售帶來不利的影響，資金的周轉漸漸出現困難。

第二期填海最後並未能如期於1925年完成。工程其後於1927年勉強完工，不過公司已沒有能力進一步開發九龍灣。除已發展的住宅外，其餘的新填地由政府收回，第三期填海工程（九龍灣中部）其後由港府完成。

其後數年間，九龍灣填海計劃的命運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下去。隨著內地及國際形勢出現轉變，英國政府及駐港英軍均同意香港必須盡快建立空軍基地，而啟德濱的新填地，隨即被視為興建機場的唯一選址。1927年3月，皇家空軍啟德基地(Royal Air Force Kai Tack)成立；三年後，機場基本工程完成，香港自此進入航空時代。

作為世界著名機場和香港地標，啟德機場源於一項不成功的地產發展項目，而何啟和區德的名字，卻因此意外地長存香港，這大概是兩人從沒想過的。



舉世知名的啟德機場。

馮平山、馮秉芬

馮平山(1860-1931)，原名朝安，廣東新會人。少年時隨父往暹羅從商，初在當地一間蘇杭雜貨店當店員，二十三歲返鄉經商，六年後開設“安記藥材店”售賣藥材。

1892年，馮平山開始參與廣州的公益事業，成為當地方便醫院及一些慈善機構的董

事。1904年，廣州農田失收，馮親自來港購米，救助饑民。數年後，馮氏定居香港。

1912年，馮氏出任東華醫院首總理。1918年又任保良局首總理，同時成為東亞銀行創辦人及股東之一。次年任團防局總理，更連任四屆，並兼任華商總會司庫。1925年，獲港府授太平紳士銜。除東亞銀行外，馮平山獨資或合資開設的商號尚有穗安銀鋪、岐豐行、兆豐行、南生行、維吉銀號、亦安銀號等。

1914年馮平山到歐美各地考察商務之餘，亦注意外國的教育發展，相對之下，香港教育事業仍較落後。馮返港後即倡辦漢文學校，也就是官立金文泰中學的前身。馮氏對教育的貢獻，可謂“年事愈高，意志愈堅”。1923年，馮平山擔任香港大學永遠值理，並捐出五萬元作大學基金。除港大外，馮氏亦大力支持在港及其家鄉興建義學及職業學校，更於1927年建議港大開設漢文科。經他及多位紳商大力捐獻，港大於同年設立中文學院。馮其後更斥資十萬元興建中文圖書館，以發展中國學術文化研究。



剛建成不久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中文學院成立後，除了培養中文人才外，對中文的研究，更帶來一片新風氣。大學為紀念馮平山的貢獻，遂把圖書館以他的名字命名。馮平山的兩名兒子秉華及秉芬(1911-2002)，均為中文學院的首屆畢業生，馮秉芬更於1930年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的首任主席。該學會的宗旨以“溝通中西學說，別其異同，辨其得失”。



1930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成立師生及有關人士合影，前排左五為馮平山，左七為主席馮秉芬，第二排右三為義務司庫馮秉華。

馮去世前雖曾表示不用葬儀，不過逝世後港府仍以軍樂送殯，以表揚其在港的貢獻及善行。

馮平山於1931年去世後，馮秉芬即接手打理其父創辦的十數間洋行，更於1938年成立馮秉芬集團。大戰前後馮一直積極參與聖約翰救傷隊工作，獲該會頒授長期服務獎章。

與父親一樣，馮秉芬對社會公益，尤其是教育及青少年工作方面相當熱心，除了出任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的校董會成員外，馮氏創辦或襄助近二十間中小學，並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董事及愛丁堡獎勵計劃主

席等。馮秉芬先後獲委任為市政局議員(1951-60)、立法局議員(1959-65)及行政局議員(1962-72)，並曾獲多個海內外勳銜和獎項，並於1971年獲頒授爵士勳銜。

馮氏歷任東亞銀行及多家公司董事，其妻為東亞銀行創辦人之一簡東浦的女兒，在政治及經濟上均舉足輕重。1972年當馮氏卸任行政局議員時，英女皇以其在接近四十年對社會的貢獻，特別批准他與周壽臣爵士一樣，可以繼續享有使用“閣下”(The Honourable)的特權。

利希慎



利希慎與長子利銘澤。

利希慎(1879-1928)，名廷羨，又名輯世，原籍新會，生於夏威夷。其父利良奕是最早期赴美當礦工的華人之一。後回港經商，又兼營公煙(鴉片)，財富漸漸累積，成為顯赫的利氏家族的奠基人。

因早年在外受教育，利希慎能操流利英語。十七歲隨父回港後，利氏入讀皇仁書院繼續學業，畢業後一度留校任教，後任職匯豐銀行。不久，利氏辭職並往馬來亞及緬甸工作，於仰光期間服務於一間船務公司，獲派為駐香港經理。之後在父親資助下開辦南亨船務公司，開始自立發展。

父親死後，利希慎與兄弟繼承父業，從澳門輸入並轉口鴉片（當時還可作合法買賣）。至1920年代，利氏家族開始在港涉足航運及地產。1923年，利希慎以三百八十萬元購入東角（即銅鑼灣）鵝頭山（又名東角山，即後來的利園山）一帶的土地，該物業奠定利氏家族在港物業發展的基礎。利希慎後來在鵝頭山附近再購地多幅，使他擁有的土地增加至十五畝。鵝頭山原屬怡和公司“大班”的花園住宅，利氏曾於上址興建一座遊樂園（“利園”之名因此而起），家族聲名自此遠播，並進而成為香港的“世家”。



約1910年從高處遠眺銅鑼灣一帶。

1928年，利希慎在中環威靈頓街遭人開槍暗殺，兇手逃去無蹤，該案其後一直成為懸案。

二次大戰後，隨著利園山的開發以及土地價格的飆升，利氏後人遂成為巨富。到了今天，利氏家族的影響仍可從利園山一帶的名字感受得來：利園山道、希慎道、蘭芳道、白沙道、啟超道、新會道、恩平道、開平道、新寧道（新寧乃台山舊稱）和利舞台等，所有這些名字均取自利氏家族、又或其四邑家鄉和人物。這些道路的開闢，無疑使銅鑼灣的地貌及景緻出現重大的改變。

莫藻泉、莫幹生

莫藻泉(1857-1917)，原名鏐章，字冠鏐。莫氏出身世家，父仕揚早年曾任職廣州十三行之一的同順行，故不乏與洋商周旋的經驗。後莫仕揚成為美商瓊記洋行(Heard & Co.)的買辦，並兩度出任東華醫院主席。像父祖輩一樣，莫積極捐資納官，獲資政大夫（正二品，捐官的最高品位）等官階。

莫藻泉早年得太古洋行買辦吳協栽培（吳氏則曾獲莫仕揚大力提攜），及至吳氏去世，從1890年起至1917年間，莫出任太古洋行香港總買辦一職。這段時期，太古洋行正值大展鴻圖，航運、糖業及船塢等方面的業務均有長足的發展。莫藻泉長袖善舞，往往把握自己的優勢以發展家族企業，獲利豐厚。



約1920年太古位於鰗魚涌的糖廠(前方)和船塢(後方)。

莫藻泉在香港出任的公職包括華商總會值理、東華醫院總理(1901)及保良局總理(1905)等，在其家鄉香山“凡鄉中公益之舉，如設義倉、修廟事、立學堂、培植風水樹木、防虞笏竹、莫不慨然擔任”。

莫藻泉大半生於香港生活、工作，去世後卜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成為莫氏家族在香港落地生根的第一代。

莫藻泉去世前已立有遺囑，把生意及遺產等交予長子幹生。莫幹生(1882-1958)生於香港，皇仁書院畢業，因此英文能力遠比父祖輩為高，更能適應買辦的工作。

莫幹生於1917年承繼父親太古洋行香港總買辦的職務後，洋行各方面繼續發展。至1928年，太古洋行的業務超越歷史悠久的



莫幹生

怡和洋行，並躍居各洋行之首。莫氏家族成為這個英資集團的中流砥柱，而其家族成員在太古更盤根錯節，並積累了巨大財富。

正當太古洋行業務欣欣向榮之際，卻漸漸萌生削弱莫氏家族影響力的念頭，除增加買辦向公司繳交的保證金及降低買辦經手的佣金外，又大力壓縮辦房的業務。1929年，洋行借故查賬索償，打擊莫幹生，加上其他或大或小的事端，莫感到意興闌珊，乃於1931年自動請辭。自此太古洋行亦取消了買辦制度，以經理制代之。

莫幹生離開太古後，專心發展家族生意，同時出任大新公司及九龍巴士的董事，並加入啟德營業有限公司，開發啟德濱。

大概由於早年曾接受正規西式教育的原故，莫幹生對文化教育的推動非常熱心，除捐款與香港大學設立太古機構工程學院外，與區德先後捐出一萬元在九龍城設立一間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民生書院。此外，莫氏亦捐助過聖保羅書院和聖士提反中學，還在母校皇仁書院設立獎學金，獎勵後進。另一方面，與祖父輩一樣，莫幹生於1917年任東華總理。四年後，莫被委任為太平紳士。1958年，莫幹生逝世，翌年獲追頒MBE銜。

鄧志昂、鄧肇堅

鄧志昂(1872-1932)，原名貫，號景雲，祖籍南海縣九江鄉，年少時隨家人來港定居，後創辦鄧天福銀號，發展頗具規模，

與倫敦渣打銀行往來業務；此外，鄧氏亦為宜安燕梳公司主席。

鄧志昂熱心公益，1905年任東華醫院主席，亦是廣華醫院創院值理，並曾出任保良局及華商總會值理之職；此外，受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1920年代，鄧響應港督金文泰的



鄧志昂

呼籲，支持並捐建港大中文學院，推動中文教育。中文學院成立時，因經費短絀，沒有專用課室，鄧志昂捐出六萬五千元興建學院院舍，奠定學院的永久基礎，其後又捐助該院各項設施，學院因而得以在1931年落成使用。一年後，鄧志昂於其位於中環歌賦街的寓所逝世。

鄧肇堅(1901-1986)早年先後入讀皇仁書院及聖士提反書院，1919年為幫助父親打理鄧天福銀號業務，沒有繼續學業，同年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

鄧肇堅從商後把父親的銀號打理得井井有條。除銀號外，鄧氏亦有其他商業投資，包括保險、渡輪等。1933年，他與雷氏家族合組九龍巴士公司，並獲得專利權。1949年以後，更先後入股油麻地小輪、恆生銀行、友聯銀行及美麗華酒店等。

二次大戰前，鄧已積極投身公益事業，確

立其“慈善大家”的地位。1924年，鄧肇堅以二十三歲之齡受推舉為東華醫院總理，1928年成為歷來最年輕的東華醫院主席，任內主持興建東華東院。1927年，鄧肇堅任保良局總理，五年後出任主席，於任內把保良局總部遷至禮頓道現址。港督金文泰爵士在1929年委任鄧氏為太平紳士，三年後香港大學委任其為校董會成員。1934年，英國政府頒授MBE勳銜並委任其為團防局委員。1937年，鄧肇堅受任市政局議員。二次大戰期間，鄧氏為勢所迫，一度出任由日人授意成立的華民各界協議會委員。



1965年鄧肇堅以東華三院永遠顧問身份於文武廟主持秋祭典禮。

終其一生，鄧肇堅獲各國頒授的勳銜達十多個，1985年更獲英國爵士勳銜，以表彰其在聖約翰機構服務五十年的貢獻。

以鄧肇堅命名的建築物、機構和學校今天遍佈港九新界，鄧氏可說是二十世紀香港慈善事業的奠基人。

韋少伯

韋少伯(1894-1944)，原名開潛，廣東三水人，法屬安南（今越南）堤岸僑商，著名中成藥“二天油”的創製者。父名敬莊，在安南執星相業，母越籍。韋少年失學，曾於商店當雜役，後跟父回鄉生活，年長婚後返安南，於堤岸廣東街開設“二天堂”藥房。

二天堂藥房主要配製二天油，血中寶和佛靈油，其中以二天油最具盛名，與當時街知巷聞的“六神丸”和“萬金油”齊名，安南人更奉之為靈丹妙藥，故得以雄據安南製藥界。韋少伯其後再展鴻圖，於金邊、河內、南洋各埠、香港及廣州等地增設分店或經銷代理，嗣後更在廣州及香港設廠生產，成品行銷國內。



1930年二天堂在中環皇后大道中開業，報章詳加報導。

韋少伯僑居海外，長居堤岸，因藥業顯赫一時，被推舉為廣肇幫（廣州府及肇慶府）僑領。商業上的成功為韋氏帶來巨大的財富，不過對早年貧寒卻未忘懷，不論在家鄉或安

南，韋均經常資助教育事業，此外亦協助僑胞排憂解難。1932年北江水暴漲，三水魷魚崗堤圍崩潰，堤內盡成澤國，韋少伯用電船運載大米回鄉救濟災民。韋氏亦曾捐巨款予廣州方便醫院及香港保護兒童會等慈善機構，並在港島巴丙頓道創辦太和醫院。

1937年中日爆發全面戰爭，韋氏義憤填膺，多次捐款抗日。1941年底香港淪陷，韋少伯避居澳門，不幸於1944年病逝該地，終年五十七歲。

葉蘭泉

葉蘭泉(1868-1946)，原名灝明，號瀚群，原籍廣東鶴山。葉少時就讀皇仁書院，畢業後任海泊般烏輪船辦房，往來南洋、荷屬印度尼西亞、廈門等地。後葉蘭泉受聘於何東，駐印泗水辦理糖務，其後洋商屈臣氏公司聘其為該公司漢口分行買辦。

四年後，葉氏返港經商，先後出任祥和棧秘魯莊監督、中國國貨公司董事及廣萬隆炮竹廠（當時香港唯一的炮竹廠）總經理等職。1919年，葉蘭泉創立鶴山商會，前後任該會主席二十七年之久。葉氏還參與華商總會的重組，且任司理達十八年。不過葉氏生前死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要算其高尚的愛國情操及救災恤災的善舉。

1914年，國民政府建立才兩年，葉蘭泉即代表國民政府在港勸募公債二十餘萬元。次年華北發生水災，時任東華醫院首總理的葉蘭泉登高一呼，募得款項十萬元賑災，國民政府其後頒授四等嘉禾勳章予葉蘭泉以作

表揚。同一年，廣東亦發生水災，除募款督賑外，葉更主張並親自參與修築堤道，以絕後患。今天位於肇慶端州區的五君祠（原稱三君祠、建於1922年），便是當時鄉民為紀念當年奮力救災的葉蘭泉及另外兩人而建的。其後的華北五省旱災（1921年）、潮汕風災（1922年），葉氏莫不悉力救賑，甚至親臨災區，協同救濟，並因此再獲授三等嘉禾勳章。

省港大罷工期間（1925-1926年），香港工潮四起，葉蘭泉積極參與調停，事件最後經多方斡旋，罷工終告平息。港府因葉氏致力公益事業，在1928年授予其名譽勳章，以誌其賢。其愛國之情亦反映在九一八事變（1931年），當時任職日本大阪商船公司辦房的葉蘭泉在得悉事變後，隨即憤而辭職，可見其愛國的深切。

1934年，葉氏與香港工業界倡組“中華廠商聯會”，初任副主席，旋任主席，並於聖保羅書院組織第一屆廠商出品展覽會（工展會前身），以推廣本地及內地工業製品。



1934年成立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首屆理事會，前排左起黃少山、葉蘭泉、羅旭蘇、周埃年、陳如山。

香港淪陷後，葉蘭泉經營的工商設施全遭破毀，百般無奈之餘，葉皈依九龍慶佛堂，潛心鑽研佛道。1945年日本投降，葉蘭泉隨即與鶴山同鄉會同仁組織難民救濟會，於港九廣設飯站，救濟無可依靠的留港難民。次年，葉蘭泉以七十八之齡逝世，其生前友好和有關團體包括何東、周埃年、東華三院、中華廠商聯會、鶴山商會等，隨即發起追悼大會，以表達哀思及懷念葉氏對香港及內地的貢獻和善行。

關祖堯

關祖堯(1907-1971)，祖籍廣東開平，生於香港。早歲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後赴英國倫敦大學取得法律學位。1931年，



先後在英國和香港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回港後，除開設律師事務所外，關氏亦擔任恆生銀號、香港鋼管公司、銀聯保險公司及工商日報等董事之職。

1941年日軍侵港前，關祖堯一度獲港府委為糧食統制處糧倉主任，惟香港不久即告淪陷。戰後初期，關獲臨時軍政府任命為軍事法庭副庭長，專門審訊日本戰犯。1946年5月，楊慕琦爵士復任港督，民政恢復，關祖堯改任首席裁判司。同年12月，港府委任關為太平紳士。1950至1951年間，關祖堯擔任香港律師會主席。

關祖堯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自1948年起擔任多個委員會的成員，並參與創設香港房屋協會。從1956年起，關祖堯開始投身政界，於該年出任市政局議員，1959年任立法局議員，至1961年更出任行政局議員，並於1966年取代利銘澤，成為行政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

在行政局供職期間，關祖堯仍身兼多項公職，當中包括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及賭博政策委員會主席等。而由關氏提交的賭博政策報告書，數十年來不單影響著港府的賭博政策，甚至對港人的生活方式，也帶來一定的衝擊。報告書開宗明義反對賭博合法化，提出賭博合法化不但不會減少賭博活動，反而替嗜賭者大開方便之門而造成社會問題；對於外圍賭博如賽馬，政府應盡早制定法例規管。



1960年代電台直播賽馬的情形。當時社會對賭博全面合法化的聲音不少，惟由關祖堯任主席的賭博政策委員會認為不應再擴充合法賭博的範圍。

教育方面，關祖堯曾出任香港大學的校董。1961年6月，關祖堯連同利銘澤、富爾敦勳爵和鄭棟材等，獲港督柏立基爵士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籌備委員會成員，並由關氏出任主席，為中大創校作籌備。期間，他曾代表中大校方，成功與政府達成協議，在馬料水撥地二百七十三畝，以作為中大校址。中文大學在1963年正式成立後，關祖堯更獲推舉為首任校董會主席，並續任至1971年逝世為止。1964年，關祖堯獲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成為首批獲中大頒授榮譽學位的人士之一，以答謝他對中大創校所作的貢獻。

關祖堯因熱心社會事務，於1959年獲授OBE勳銜，六年後再得CBE勳銜；及至1969年元旦，更獲封為爵士。

1971年12月7日早晨，關祖堯在行政局會議中突然心臟病發，雖經醫護人員搶救，可惜返魂乏術，終年六十四歲。剛上任不久的港督麥理浩爵士發表悼文，形容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絕不畏縮，其盡瘁工作，竟迄其最後一分鐘始休”。關祖堯去世後，行政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之職由簡悅強接替。

今天位於葵涌的祖堯邨，是以關氏的名字命名，一方面因為他參與創立房屋協會，另一方面亦藉著命名，紀念他對香港的貢獻。

黃克競

黃克競(1906-1996)，原籍廣東新會，香港出生。童年時居於泰國，至十一歲返港，入讀聖士提反書院。畢業後，黃氏投身樹膠製品工業，後曾作多方面嘗試，包括電子、紡織、塑膠乃至造船工業等。



香港淪陷期間，黃克競離港逃難至廣州。戰後黃氏返港，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重新投入工業生產。1957年，黃氏毅然放下發展穩定的塑膠業務，大膽嘗試製造光學儀器，創辦寶源光學儀器公司。寶源光學的製品其後遠銷海外，漸漸打破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對相機及望遠鏡市場的壟斷；與此同時，黃氏亦於歐美及日本開設分公司以推廣業務。

為回饋社會及支持香港工業教育，黃克競曾捐助黃克競工業學院的創設及香港大學工程學院黃克競樓的興建。在此之前，黃氏亦曾出任東華三院、保良局、中華廠商會等總理及會長之職。基於對香港工業發展的貢獻，港府分別於1968年及1981年頒授OBE及CBE勳銜與黃氏。

戰後香港工業發展成功，一方面固然要歸功於來自內地的移民勞工和資本家，不過如果沒有像黃克競這些有遠見且富開創精神、踏實苦幹的本土工業家，香港工業發展的歷程可不一樣。

參考資料

政府檔案及官方文獻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Series 129 (CO129)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s (香港轅門報/香港政府憲報)

The Hong Kong Blue books

中文著作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

丁新豹：《人物與歷史：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香港：香港當代文化中心，2007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2年

文灼非：《香江百人誌》，香港：壹週刊48期特輯，1991年

冼玉儀、劉潤和（編）：《益善行道：東華三院135周年紀念專題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

李培德：《繼往開來：香港廠商75年(1934-2009)》，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

宋軒麟：〈九龍城地標之二：啟德濱與啟德機場的興建〉，載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2年

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1937

周壽臣：《馮平山先生七十壽言囊集》，1919年

高添強：〈香港墳場發展史略：1841-1950〉，載梁美儀、張燦輝（編）：《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合編）：《買辦與近代中國》，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

陳大同、陳文元（編）：《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

莫應淮：〈英商太古洋行近百年在華南的業務活動與莫氏家族的關係〉，載《廣東文史資料》第四十四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張曉輝：《香港華商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

鄧志清：《港澳聞人錄》，香港：美聯社，1958年

萬建忠：《中國歷代葬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年

劉富索等：《劉公鑄伯行述》，1922年

鄭宏泰、周振威：《香港大老：周壽臣》，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

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長：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

《香港大會堂開幕紀念特輯》，香港：香港文化事業公司，1962年

《葉公蘭泉紀念冊》，1946年

英文著作

Dennys, N.B., (Ed),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Vol. 1,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73

Ho, Eric Peter, *Tracing My Children's Lineage*,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Lethbridge, Henry J.,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oy, Vivienne, *Profit, Victory & Sharpness: The Lees of Hong Kong*, Toronto: York Centre for Asian Research, York University, 2006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right, Arnold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 Ltd., 1908

報章

華字日報

工商日報

華僑日報

大公報

China Mail（德臣西報）

Hongkong Telegraph（士蔑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孖喇西報）

Hongkong Daily News